

#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Anthrop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 In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4-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韓, 敏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5021/00008981">https://doi.org/10.15021/00008981</a>

## 日本与中国的人类学互动 ——以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例

Anthrop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韩敏

HAN Min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nthropolog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and the methods of Chinese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Japan,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located in Osaka and commonly known as “Minpaku”.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elaborates on the research mo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China. Modern Japanese anthropology in China started in the context of defining the Japanese nation and its cultural roots. Thus, Japanese scholars tend to understand Japa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other surrounding cultures in the framework of Asia or the world.

The second part explores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s and exhib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npaku by focusing on research and exhibitions.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74 and opening to the public in 1977, Minpaku has functioned as a major center of research on anthropology in Japan and in Asia. Here, I examine the 15 Inter-University Research Projects of Chinese research projects (1982–2017), and the history of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Minpaku and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SEAC), Institute of Et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Palace of Ethnic Culture.

The third part deals with one of the 15 projects above, Social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volution (2004–2006). The project marked a new stage of Chinese study both in Minpaku and in Japan. By revealing the procedure of joint research and the process of generating new framework for the Chinese modern revolution, we can see how Minpaku has gradually become a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in Japan.

### 序言

本章试图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下简称民博）为例，考察日本与中国的人类学互动

以及日本对中国及周边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和特点。本章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笔者将阐述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动机和特点。日本近代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可以说正是在日本人对日本民族的界定和文化寻根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日本的民族学者一开始是在亚洲或世界的框架下,来认识日本及其它与中国等周边文化的关系。

第二个部分探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学术研究的经营和文化展示特点。民博创建于1974年,197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2017年11月民博迎来了开馆40周年。民博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是日本最大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一个拥有34,5万件世界文化标本资料的博物馆。它的创立宗旨是通过收集实物、影像记录、田野调查和研究向人们提供有关世界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最新信息与知识,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并揭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共同性。笔者通过梳理1982年到2017年时间里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的15个共同研究课题的脉络,将这34年的中国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并分析了每个时期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特点。同时,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博物馆,民博也是20世纪后期重要的文化交流场所,为日本及世界各地提供了文化和学术交流的平台。笔者在本文还将探讨1979年以后在民族资料的收集和学术考察等方面民博与中国国家民族委员会,民族文化宫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央民院等学者的合作历史,并指出民博在民族文化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实践方面,逐渐形成了与当地的政府,学者和社会的交流模式。

第三部分以笔者为课题组代表的共同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及重构—以革命的实践与表象为中心”(2004-2006年度)为个案,具体地揭示了课题组启动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思索和运营过程,并探讨了参与共同研究的学者之间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有关近代革命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成果。同时也以此为例,揭示了民博逐渐成为日本的中国人人类学研究基地的过程以及它与日本国内外大学等学术机构和学者共同研究的学术模式。

## 1. 日本对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和视点

在日本,人类学研究通常被认为始于1884年(明治17年)。当时身为东京大学理学部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坪井正五郎与有坂绍藏、白井光太郎等9位年轻学者在东京成立了叫做“人类学之友”(后来改称为东京人类学会)的学术团体,并于1886年创刊了人类学会的会刊,《人类学会报告》(后曾改名为《东京人类学会报告》《人类学杂志》)。也就是说,人类学学术团体的成立以及该学术团体的刊物发行标志了这个舶来品的人类学学科在近代日本的诞生。

### 1.1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文献价值

日本的人类学研究始于1884年,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是在1884年之后吧?著名的东亚人类学者末成道男教授曾指出过“日本对中国的民族志的研究远远早于19世纪末日本人类学的形成之前。最早的民族志的文献可以追溯到9世纪日本的入唐请学僧人、圆仁(794~864)<sup>1)</sup>的日记体文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円仁1970;圆仁1986)”(Suenari 1995: 1)。圆仁在中国旅行期间撰写的日记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正式旅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末成道男向我们提示了从历史文献中寻找民族志的研究价值。

圆仁是日本高僧，日本天台宗第三代祖师，谥号慈觉大师，入唐八家<sup>2)</sup>之一。当时已45岁的圆仁作为请益僧跟随日本朝廷组织第十九次遣唐使团也是最后一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圆仁一行于838年（承和5年）6月13日从日本的博多津港口出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日记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写的。从志贺岛到中国的扬州东梁丰村共在海上度过了8天。当圆仁登陆时，正是唐朝开成3年的7月2日，也是日本的承和5年7月2日。日本和唐朝虽然使用不同的年号，但却是同样的日期，圆仁曾为此十分感慨<sup>3)</sup>。

圆仁一行经青州（今山东益都）、淄州（今淄博市）、齐州（今济南市）、德州、唐州、冀州（今河北冀县）、赵州（今赵县）、镇州。840年在他实现了夙愿五台山的朝觐。在那里，他得到了「未决三十条」的答案，并抄写了尚未传到日本的五台山所藏佛经37卷。之后又步行1100公里用了53天，从五台山经并州（今太原市）、汾州（今山西汾阳）、晋州（今平阳）、蒲州（今永济）、同州（今陕西大荔）走到了当时世界最大都市，最先端的文化大都会长安。奉敕居住在左街崇仁坊的资圣寺，一住近五年。圆仁的足迹遍布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等七个省。旅行期间，圆仁撰写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记，这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正式旅行记，记载了当时唐朝武宗压制佛教的“会昌灭法”事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广泛接触了当时中国的僧侣、官吏、百姓，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大小事件。其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凝聚在这部以日记体裁记录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之中。圆仁不仅给日本留下了宝贵的佛教经典，也给我们留下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唐朝帝国的首都以及地方草根社会的翔实纪录。这部民族志文献的学术价值还有待后人的研究。

## 1.2 近代的日本人类学对日本、中国和周边社会的关注

近代的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始于明治维新以后，它的学术动力应该说来自日本知识界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重新寻找日本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的过程。明治以后，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国家中唯一的与欧美列强为伍的国家。这也给近代日本人带来身份认同的不安，因此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日本人撰写的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例如，内村鉴三的（1861-1930）的《代表的日本人》（Uchimura 1894）、志贺重昂（1863-1927）的《日本风景论》（志贺 1894）、新渡户稻造（1862-1933）的《武士道》（Nitobe 1900）、冈仓觉三（1863-1913）的《日本的觉醒》（Okakura 1904）、《茶之书》（Okakura 1906）等等。日本的文化人类学者、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船曳建夫指出，“这种不安源于日本在近代中特殊的历史地位——不属于创造了近代的西方地域历史的社会”（船曳 2011: 10）。也就是说，日本在于欧美列强为伍的近代化过程中，急于寻找自己的地缘、社会和文化的定位。在日本近代的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日本的民族学、人类学综合了自然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及其研究成果，思考并试图界定日本的民族和文化。这便形成了20世纪初日本民族学的主要课题。

近代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日本人对日本民族的界定和文化寻根的背景

下展开的。例如，日本的民族学者一开始是在亚洲或东亚的框架下，来界定日本及其它与中国等周边文化的关系。当时关于日本民族起源的学说大致分为一元论和多元论。日本民族起源一元论的学说认为日本的原住民就是阿伊努族<sup>4)</sup>。而日本的人类学创始人之一、东京大学教授坪井正五郎则认为在阿伊努族传说中的矮人神、北海道先住民，即前阿伊努族的小矮人（*korpokkur* 可洛波库尔）是日本真正的原住民。

日本民族起源的多元论中又分为南方起源学说和南北方混合起源学说。例如柳田国男就认为日本的稻作文化是从中国南部经过日本的西南岛屿北上到刀耕火种的山地民族地区，而原来刀耕火种的山地民则因此移居到更偏远的山里。

认同南北混合学说的学者较多。鸟居龙藏<sup>5)</sup>（1870-1963）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及民俗学等综合方法进行了考察。他早在1895年（明治28年）便开始了辽东半岛考察，后来相继在台湾、中国大陆西南部、西伯利亚、千岛列岛、冲绳等东亚各地调查。1902年7月—1903年3月，主要对贵州省的苗族和云南省的彝族进行了调查，探索了西南中国与台湾和日本的共通性。他还使用神话、宗教和考古等比较方法，认为来自中国南方、东北满洲和蒙古的人群汇集在日本群岛，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鸟居 1918）。岡正雄用历史民族学的方法提出了“种族文化复合”的理论。他指出5个种族或文化在不同时期从大陆流入日本，重叠地形成了日本的民族和文化（岡 1958;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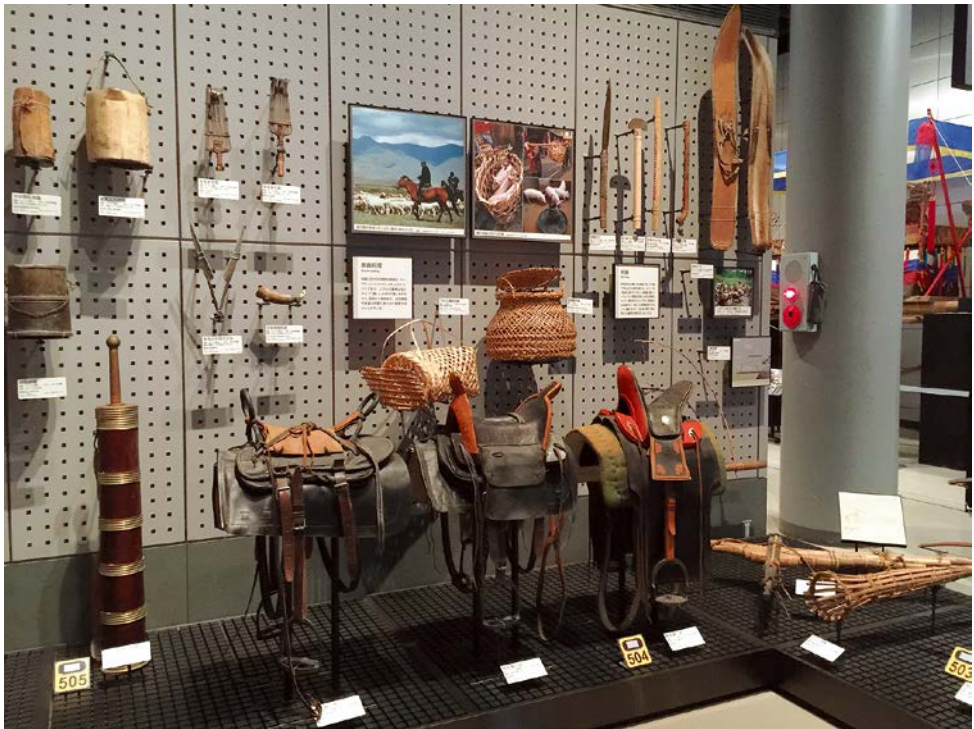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创始人之一、第一代馆长梅棹忠夫以及第二代馆长佐佐木高明用生态/生业/文化地理的观点探索了日本民族—文化的本质和起源<sup>6)</sup>。梅棹忠夫在原有的东洋·西洋的区分基础上，提出了中洋的新概念，并通过对汉族农耕民族与蒙古游牧民族接壤地带的调查，用生态环境的干燥、准干燥和湿润等概念把欧亚大陆分为两种地区，指出西端的西欧和东端的日本都处在第一地带——湿润地带，其内部结构原本就很相似。也就是说，在梅棹忠夫看来，日本与其与亚洲各民族相比，不如与西欧的结构更为接近。他认为在干燥和准干燥的第二地区产生了人类文明；同时侵略和破坏行为产生了移民，因此也随之产生了异文化混合的复杂社会。而第一地区或是因为中纬度温带的良好条件，或是因为少有外来的暴力，可凭借自身的力量发展（梅棹 1957）。梅棹忠夫的日本文化论可以称之为文明生态学。

民博第二代馆长佐佐木高明用生态、植物、文化地理的观点来探索日本民族—文化的本质和起源，并和中尾佐助一起从生态环境、文化地理决定社会文化的观点，提出了照叶树林（常绿阔叶林）文化论。照叶树林是从喜马拉雅山地中部，尼泊尔、不丹、东南亚、云贵高原、长江流域的江南山地到西南日本的特有植物。这种植物生态学和文化类型学相结合的独特文化论认为自然生态可以塑造文化，相同环境的植被塑造了相似的文化。例如饮食文化中的紫苏、粘糕、酱等发酵食品、发酵茶、丝绢、高脚建筑以及山神的信仰、男女对歌等文化要素都是上述照叶树林文化地带的共同特点（佐佐木 1971; 1982; 1993; 1997; 2007）。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佐佐木高明在民博主持了题为《日本文化源流的比较研究——以民博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1978-2000）。这个课题对作为日本民族学研究基地的民博来说，是具有战略性的最重要课题。它的实施及其研究成果为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论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作为该课题的主持人在《日本史诞生》

(佐佐木 1991) 一书中, 概观了旧石器时代到引进稻作的日本基层文化形成过程, 并在《日本文化的多重构造》(1997) 一书中用“常绿阔叶的照叶树林文化”, “落叶阔叶 / 常绿针叶的植林文化”<sup>7)</sup>及“稻作文化”等文化类型的概念, 从民族学的角度提出了日本文化的多元、多重结构的学说(佐佐木 2009: 218-221)。

后来民博第三代馆长石毛直道通过饮食文化以及制作技术的考察证明并完善了照叶树林文化的理论(小崎、石毛 1986; 石毛、ラドル 1990)。民博的朝鲜半岛、日本、中国、东南亚等展厅可以说是在这些学者的理论构思下建构的文化展示(照片 1)。换言之, 民博的世界文化展示框架是在生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理论视野下构建出来的。

除了上述的有关日本民族起源的单一学说、多元学说、文明生态论、照叶树林文化论、饮食文化论之外, 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王朝说(江上 1967)、大林太良的《日本神话的起源》(大林 1973)、《王权神话》(大林 1984)、江守五夫的《婚姻的民俗: 东亚的视点》(江守 1998)、《日本的家族与北方文化》(江守 1993) 等等也可以说是在与中国等亚洲地区的比较框架下探索日本文化多元论的研究成果。此外, 还有以中华世界的中心与周边的理论框架, 即中国文明(文化)与朝鲜半岛、日本等周边社会互动的人类学研究视点(末成 1997, 1999, 2007; 渡边 1990, 2001) 也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可贵的独到之处。



照片 1 多样的生态环境孕育的多元生业形态。2017年 8 月韩敏摄于民博的中国展厅。

总之, 12个世纪前日本僧人在中国寻求佛教真经, 吸收佛教和儒教文化的过程中, 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翔实地描述了唐朝社会的民族志文献。而近代的日本人类学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为了解决自我认同和确立文化身份等近代化过程中的困惑, 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本土、欧美等地的中国人类学相比之下, 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基于对生态地理环境的考察, 并以世界五大洲的文明圈和文化圈的宏观视点、以文明生态学的框架研究中国大陆的多元的复合文化以及与日本生态、生业和文化的关联性(梅棹 1957; 佐佐木 1971, 1982, 1993, 1997, 2009)。第二个特点是基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理论视野(石毛 1973, 1982, 2005; 石毛、ラドル 1990)俯瞰中国。第三个的特点是注重比较的人类学研究。例如中根千枝的亚洲社会的比较(中根 1981; 1987; 1999), 末成道男的东亚社会的家族形态的比较和他主持的东亚社会中心与周边的比较(末成 1999; 2014)以及渡边欣雄的亚洲社会风水实践的比较研究(渡边 1990; 2001)。

以上日本人类学的研究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界, 并反映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经营和文化展示上。笔者将在下一节以民博为例, 探讨人类学博物馆在中国的民族资料的收集和研究的的特点以及在与当地政府、民众与学者的文化交流中实现多元包容的文化展示和人文研究的过程和机制。

## 2.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及其中国民族资料的收集与研究

民博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相关学科的世界级研究机构。该馆现有专职研究人员51名(2017年11月), 包括21名教授、28名副教授和2名助教。其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包括了世界七大洲。民博具有研究、展览、教育是该馆的三大功能, 这里, 笔者将以中国民族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所为例, 探讨民博的资料收集、展示和研究的互动关系。

### 2.1 在与中国政府、学者和机构的文化交流中实现民族资料的收集

民博1977年11月正式开放时, 几乎没有新中国成立后的资料标本, 因此也就没有建中国展厅。当时日中之间虽然恢复了外交关系, 可是在民族资料的收集和现地调查等方面, 日方学者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不过,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 民博作为中日文化和学术交流的窗口和平台, 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以及政界和文化界开展了各种学术交流(参照本文附录)。民博的早期中国民族资料的收集, 就是在这样的交流和互动中实现的。具体地说, 是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直接关照下, 在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央民院以及社科院等协助下收集起来的。

1978年11月, 时任民博第二研究部部长的佐佐木高明教授作为梅棹馆长的代理, 参加了由民博的元老诚茅先生担任团长的日本民间访华团来到北京。期间参观了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民族活动展览会”, 并参观了中央民族大学、社科院民族所和民族歌舞团, 并同这些

机构的学者进行了会晤。11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当时担任科学·学术的方毅副总理的接见。席间，佐佐木高明提出了在中国收集民族资料的愿望。他说“作为世界的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展览机构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现在没有一点中国方面的资料。希望阁下为我们收集民族资料提供帮助”。方毅副总理当即给了一个明快的回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愿意提供你们所需的展品资料”（佐佐木 1980: 2-1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是中国政府专门掌管少数民族关系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会见后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9日，佐佐木同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并马上同当时国家民委副主任江平和民族文化宫主任代理杨廷智进行了会晤。佐佐木提出需要收集以民族服装和乐器为主的各地少数民族资料，并对中方说明这些标本不仅可以作为民族学的研究资料，还可以在民博展览，是有助于日本的民众理解中国文化的资料（佐佐木 1980: 2）。1979年10月民博的首次访华代表团一行4人来到北京，团长是佐佐木高明，同行的有君岛久子、藤井知昭和大丸弘三位教授。10月23日民博代表团在民族文化宫同中方代表举



照片2 民博通过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宫在西藏收集的珞巴族男子服饰。  
2017年8月韩敏摄于民博中国展厅。



行了会谈。中国民族文化宫以顾问林耀华教授、主任代理杨廷智为中心，顾问吴泽霖教授和宋蜀华副教授出席了会谈。25日佐佐木高明作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代表，林耀华教授作为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宫代表在民族文化宫的大厅里正式举行交接协议，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照片2中的珞巴族男士服饰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于1980年通过中国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从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收集来的。

就这样，1979年10月25日佐佐木高明和林耀华作为日中双方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交接协议之后，民博开始了通过民族文化宫在中国间接地收集民族资料标本的历史。具体地说就是民博提供需要收集的标本资料名单，民族文化宫根据日方的要求在中国各地收集和购买，并把这些资料汇总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民博派学者来北京民族文化宫验收资料后，付款并将资料发送运回民博。这种通过民族文化宫的间接收集模式从197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期。日本学者可以直接“在地方收集资料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塚田 2005: 19）。在近20年的时间里，民博的梅棹忠夫、佐佐木高明、君岛久子、藤井知昭、大丸弘、松原正毅、小长谷有纪、塚田诚之、周达生、横山广子等研究人员曾多次到北京参加资料的交接仪式，并同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的学者进行了交流。这种交流一直持续到现在。

例如，2010年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杨晶以及该委员会的国际交流司等随行人员来民博进行文化交流。期间，须藤健一馆长对国家民委和民族文化宫在民博中国展厅初建时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杨晶主任也提出了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建设规划，并希望民博在规划和技术方面给予支持。须藤馆长当即表示，我们不会忘记国家民委和文化宫的支持，帮助创建中国民族博物馆是民博义不容辞的责任。2012年和2015年，中国民族博物馆顾群馆长以及该馆的广告、信息处理、研究等部门的负责人多次来民博访问，并同民博的须藤馆长以及中国组的学者们就民族博物馆的建馆和运营理念以及在资料的收集、展示和研究等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日双方一致希望中国国家民族博物馆建馆早日实现。

民博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交流包括了标本收集、共同调查研究、互赠学术刊物、共同出版书籍、学者的互访交流等多方面。例如，1979年民博梅棹忠夫馆长访中与中国民族学者及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员进行学术·文化的交流，并视察诸博物馆和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向民博赠送《民族研究》直至现在2017年11月27日现在（参照本文附录1979年一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本文附录里记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林耀华、中日友协会长韩念龙、京剧演员张君秋、电影演员张瑞芳等来访者的名单上可以看出，民博与中国的交流不仅停留在民族学/人类学方面，民博还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学术交流以及戏剧、电影等公共文化事业的交流提供了平台。附录所列举的仅仅是1980年代到90年代民博和中国学术界、文化界交流的冰山一角。作为日本及亚洲人类学的研究基地和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民博与中国的交流以及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和文化的效应无疑是今后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 2.2 民博有关中国的共同研究

民博是日本，也是亚洲和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中心之一。在它的研究、展示和教育的三大功能中，研究是最为重要的功能。民博也是文部科学省指定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作为大学共同利用机关，它的最重要的研究活动就是共同研究，也就是说民博的专职研究人员同馆外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某个共同课题进行共同研究。通常一个研究课题组的期限在2-3年之间。下面笔者主要谈谈有关中国的共同研究。

### 2.2.1 牵引日本的中国人人类学研究

笔者2000年4月开始奉职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各种资料来看，民博的有关中国的共同研究始于1982年，到2017年11月为止的34年多时间里，民博一共展开了15个共同研究课题项目，并出版用日文和中文出版了其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这34年的共同研究的历程中，研究的对象和视点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笔者根据共同研究的方法将民博的15个研究项目划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表1）。

表1 民博有关中国社会的15个共同研究课题组（1982-2017）（笔者制作）

一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① 民间传承的比较研究（君岛久子 1982年3月、12月）</li> <li>② 中国少数民族的基础研究（佐佐木高明 1984-1985年度）</li> <li>③ 以满族为核心的中国东北的文化复合——满洲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畑中幸子 1986-1987年度）</li> <li>④ 汉族的地域性及其认同——以中国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整理和分析（竹村卓二 1987-1989年度）</li> <li>⑤ 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的汉化的诸侧面——以仪礼为中心的整理与分析（竹村卓二 1991-1993年度）</li> </ul>
二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⑥ 中国大陆诸民族的移动和民族性——以华南地区为中心的整理和分析（塚田诚之 1994-1996年度）</li> <li>⑦ 中国大陆诸民族的移动及文化动态——以周边地区为中心（塚田诚之 1997-1999年度）</li> <li>⑧ 少数民族和法制度的比较研究（横山广子 1998-2000年度）</li> <li>⑨ 中国民族表象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以南部地区为中心（长谷川清 2000-2002年度）</li> <li>⑩ 中国民族表象的政治——以南部地去为中心的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塚田诚之 2003-2005年度）</li> </ul>
三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⑪ 中国的社会变化及重构——以革命的实践与表象为中心（韩敏 2004-2006年度）</li> <li>⑫ 资源的生成与变化——以华南地区为中心的人类学及历史学的研究（武内房司 2006-2010年度）</li> <li>⑬ 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重构——全球化/本土化的视点（韩敏 2008-2012年度）</li> <li>⑭ 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话语（韩敏 2012~2014年度）</li> <li>⑮ 资源化的「历史」——中国南部诸民族的分析（长谷川清 2014-2017年度）</li> </ul>

首先早期的5个课题组，在1982年代初开始到90年初为止。它是伴随着民博在中国间接的民族资料的收集和在中国学者协助下的中国调查基础上进行的。从上表所示的早期5个研究班

课题可以看出如下的几个特点。

首先，民博早期（一期）的有关中国的共同研究的课题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日本人类学的特点—从神话、社会组织、生态及种植加工技术等方面寻找日本文化的起源以及与中国北方或南方文化的相关性。例如，君岛久子组织的民间传承的研究通过与中国、东亚以及中亚/东北亚的比较，探讨了日本文化的源流形成的轮廓（君岛 1989）其次，畑中幸子组织的共同研究从语言学、东洋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的角度探讨了东北地区满族和其他民族的语言、习惯和信仰的特点，揭示了满族文化的复合性（畑中、原山 1991）。早期民博的中国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偏重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此外，以南部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民族性为主的民族学研究也是这个时期民博的研究特点。例如，竹村卓二组织的两次共同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视野下探讨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民族界限等问题（竹村 1994）。汉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或从周边民族来看中华文明的双向、多元的视野是民博，也是日本的中国人人类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二期）的5个研究课题组在初期的对民族性、民族界限的基础上，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以移动、表象和民族性为焦点对跨地域或跨国境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动态分析（塚田、瀬川、横山 2001；塚田 2003；长谷川、塚田 2005），不过，从研究对象上看，这个时期的研究仍然是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主。此外，横山广子组织的“少数民族和法制度的比较研究”的共同研究班（1998-2000年度）以法律制度为切入点对中国国家法规、地方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行政管理、泰国、尼泊尔、印度、越南、缅甸的民族法、菲律宾原住民、俄国、立陶宛、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台湾原住民以及国际机构对民族和民族法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横山 2001b）<sup>8)</sup>。

2004年开始的共同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及重构—以革命的实践与表象为中心”（韩敏 2004-2006年度）标志着民博的中国研究走进了三期的新阶段，笔者将在下一节，集中探讨该课题组的运营过程及其学术成果。这个阶段的5个课题组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民族性、民族移动等研究成果基础上，注意到了近代革命对民族文化、服饰、宗教礼仪、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也以更广泛的全球化/本土化的视觉，关注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例如，“民族文化资源的生成及变化—以华南为中心的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武内房司 2006-2010年度）以及“资源化的「历史」—中国南部诸民族的分析”（长谷川清 2014.10-2018.3）开始注意到了民族文化的资源性以及如何被政府、知识精英、企业、一般民众所利用的政治性问题（塚田 2008, 2017；武内·塚田 2014）。以笔者为代表的课题组“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重构—全球化/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视点”（韩敏 2008-2012年度）首次把中国社会和文化放在近代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背景下，以微观的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为基础，揭示了人们在接受全球化影响的同时，还在不断地重新构筑自己的群体、地域性、民族性、国民性以及自己的根（韩 2015）。

除上述的共同研究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博的机关研究，“中国的家族·民族·国家话语”（韩敏 2012-2014年度）。与以往日本国内共同研究不同，这次的机关研究是在2012年8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北京社科院民族所签订学术交流



照片3 国际研讨会“中国的社会与民族—人类学的框架与事例研究”的东亚与会者。  
2012年11月 阿古娜斯卡 摄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协议基础上，并由日本、中国本土、台湾、香港、美国、韩国等的学者参与的国际共同研究（照片3）。本课题组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探讨有关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及其动态的人类学理论框架。第二个目的是通过日、中、韩东亚人类学者的对话，以家族、民族、国家为焦点来探讨在近代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构以及全球化过程中，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在日常生活、信仰、历史记忆、文化遗产、移动、城市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的展现和实践（韩、末成 2014）。

综上所述，民博有关中国的共同研究始于1982年，反映了近代日本人类学的特点，即寻找日本文化的起源以及与中国的北方或南方文化的相关性，其研究对象通常是南方或北方的少数民族。同时也汉族已到了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以及从周边来看中华文明的多元性。进入90年代的中期共同研究逐渐把关注的重点从历来的对民族性、民族界限转向民族的移动、民族表象等问题意识上。进入21世纪之后开始的第三期共同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以西南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传统，同时也通过导入了近代革命、社会主义近代性、全球化/本土化的视点，对民族文化资源化的过程和机制、家族/民族/国家话语的变化和延续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在34年中15个从其课题的前沿性、成果的数量以及参与课题的学者范围来看，可以说，民博牵引了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并成为日本的中国地区的研究中心。

### 3. 开拓近代中国革命的人类学研究

以笔者为课题组代表的共同研究，“中国的社会变化及重构—以革命的实践与表象为中心”（韩敏 2004-2006年度）标志着民博的中国研究走进了新阶段，这个课题组首次在民博乃至日本启动了有关中国近代革命的人类学研究（韩 2009）。因此，在这一节里，笔者将以该课题组为例，具体地揭示民博第三期的中国研究的复合视点、课题组的运营过程，并探讨有关中国近代革命的人类学分析框架和参与本共同研究的学者之间互动过程及研究成果。

本课题组由民博的4名学者以及来自日本19所大学的20名学者构成。他们主要来自人类学领域，也有一些是来自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课题组的24名成员<sup>9)</sup>中有十名是在中国直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并在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留学，现已在日本大学执教的华裔学者。而研究班的一些日本学者也曾在60、70年代在日本间接地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些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日本民博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为期2年半的讨论。在此期间里，课题组在民博召开了14次研究会，21名学者作了研究报告。另外，还临时邀请了原韩国人类学会会长、首尔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金光亿教授、中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周大鸣教授和王建新教授作了特别报告和演讲（照片4）。其中王建新的研究发表也被编入了共同研究的成果论文集里。

古汉语中的“革命”表示革天之命，它意味着改朝换代，是天子因接受了天命而即位的意思。现代汉语里的革命是从现代日语中借用过来的，是英语 *revolution* 的对应词。而现代意义的“革命”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革命是指被统治的阶级从统治阶级那里夺取政治权力，改变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政治变革。法国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就属于此类。广义的革命是指事物由一种状态激烈地转变成另一种状态。它可以用来指在经济、法律制度、文化、宗教、艺术、语言、风俗习惯等任何社会领域方面发生的剧大变动。英国的产业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属于此类。



照片4 周大鸣和王建新与民博研究班的部分成员座谈。2006年6月于民博。木村自 摄影。

课题组成员经过讨论，决定把“革命”一词定位在现代的广义上，并把辛亥革命及其影响也列入到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笔者认为“革命”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揭示中国社会变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辛亥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从理念变成了现实，被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并通过日常的生活实践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根，并在近代史上形成了另一个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诸种制度、话语和象征在日常的生活实践、旅游、艺术、民间信仰等领域被重新构建、表象和消费（韩 2009: 1-15）。本课题组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课题组每个成员在中国基层社会的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考察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诸种制度和传统与已有传统之间的断层和延续性，并从个人、家族、地域社会等角度阐明近代中国革命的实践意义和本质。我们的研究方法不是把焦点放在少数政治家或思想史，而是从表象（representation）、民众的实践（practice）等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是如何被意识形态化、制度化的；个人、家族、地域社会等是如何把国家的理念和制度内化；为了回应激剧的变革他们又如何策略地调整亲族组织、婚丧嫁娶、民间信仰的。这种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和表象直接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在日本为首创，不仅为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界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也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 3.1 表象与实践 揭示近代中国革命的分析框架

中国的近代革命是至上而下的，它动员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那么人类学在考察近代中国革命对草根社会的影响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视点呢？我们在开始时，做了一个假定，就是假设实践（practice）和表象（representation）是两个有效的概念和工具。

这里所说的表象是指象征，或者说是象征性地表示或代表某个事物。具体地说，表象都是通过语言、旗帜、服装或发型等象征对已有的实际存在，进行意义生成的行为。涂尔干（Durkheim）曾指出：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皆由表象而成（デュルケム 1978: 21）。表象分为个人表象（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集体表象是某个集团的成员所共有的共同的知识和感情的象征，它既包括旗帜等表现为物质形式的象征物，也包括人们看待世界和决定人们看待世界方法的基本概念，如神话、信仰和意识形态等。而个人表象则与集体表象不同，它意味着每个个人的经验。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表象都是指通过图像、符号等形象标识对已有的现实进行意义生成的行为。而且在这种表象行为中往往含有与个人或集体的主张和利益等有关的政治因素。

共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实践。实践有两层含意。首先它是指行为，作为理念的对应词；它的另一个意思是指人对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改造。课题组的成员从不同的理论纬度（毛 1968; プルデュ 2001; 田辺 1989; 田辺、松田 2002）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宣传画、小人书、服饰、电影、民间曲艺的表演和创作实践等个案进行了分析，并探索了国家言说的内在化、新中国妇女形象的塑造、英雄人物的产生和宣传的过程。

“宣传（propaganda）”作为社会动员的重要的视觉手段，是把为政者的话语转换为草根社会

话语的重要接点，这种视觉性强的集体表象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牧阳一利用大量的宣传画、图片等资料，对建国后“宣传”中的女性表象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了革命中国的妇女表象与前苏联的妇女表象的相似性，并指出了这种抹煞了女性性的表现手法源于以男性为规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牧 2009: 53-73）。武田雅哉则通过对大量的雷锋照片、宣传画、连环画、小人书、漫画等进行的比较，分析了英雄人物雷锋表象的时代变化，并从文化论的角度揭示了革命的“傻子雷锋”与古典神话系谱中的“愚者”、六朝时代《世说新语》中的奇人、怪人以及近代文学中的阿Q之间的相似性（武田 2009: 131-154）。他指出革命英雄与传统英雄在叙述方法上存在着文化上的连续性。同时在道德沙漠化的今天，“雷锋”的意义已经从对共产党的忠诚变成“助人为乐”。在市场经济的中国，“雷锋精神”也似乎象征着买卖的公益性和诚实性。

服饰与革命表象是本课题组关注的另一个侧面（汪 2009: 75-106; 周 2009: 437-474）。汪晓华对文革期间的军服成为国民服装的原因和普及程度进行了分析。她从1999年到2001年3次在北京、沈阳、武汉对36岁到72岁的知识分子、干部、工人、退休人员共250人进行了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个人拥有军便服的件数、对军便服·便服的认识、穿着场合、穿着的心情·感觉等。北京·武汉·沈阳三大城市的军便服普及程度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似乎与近代革命的中心地带、红卫兵势力的强弱、造反派武斗的程度等因素有关。她通过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对服饰文化影响的比较研究，指出了文革军便服的流行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关系（8次接见红卫兵），并阐明近代的中国服装是政治理念和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的视觉表象。相比之下，周星从百年近代服装史演变的角度，用“制服社会”的概念来解释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以及文革时期的服装意识和军便服的普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服装出现前所未有的多重性，首先是西装在城市的普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穿上了西装。同时中山服在国家领导层中仍具有正统的象征意义。在部分农村地区，中山装作为革命的记忆仍然继续存在着。他还利用英特网上的争论和信息，着力对唐装、汉服和汉服运动的状况和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近年民众在服饰上的新追求和争议既有来自对欧美国际社会的意识、对东亚社会的和服、韩服的等国民服装的意识，也有来自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影响。大众文化的国际化现象（韩国的“大长吟”、日本的“大奥”、和中国的“汉武帝”等电视剧的影响）也是促使人们希望确立民族服装的要素之一。

西泽治彦用人类学的文化解释方法和象征手法对中国电影中的文革描述进行了分析。他列举了《牧马人》、《芙蓉镇》、《蓝色风筝》、《活着》、《霸王别姬》、《孩子王》、《太阳少年》等电影，对导演、革命的内容事项、文革发生的舞台、文革电影的登场人物进行了分类。通过对居委会和街道干部的观察，他指出居委会和街道委员会是城市政治动员的工具。从电影的主题方面，中国电影的文革描写表达了伤感、仇恨和怀旧等情绪，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反思和对社会结构的疑问（西泽 2009: 107-130）。

民间曲艺的革命化实践是日中学者共同关注的另一个课题。在中国汉族农村地区长期从事曲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井口淳子通过对河北滦县的乐亭大鼓的文本、河北曲艺作家韩起祥和高荣远的个人生活史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陕西米脂杨家沟村的自编歌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在北方农村

曲艺说唱中的革命实践和革命记忆（井口 2009: 29-51）。她指出，在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台湾，曲艺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曲目上，而大陆的革命给传统的曲艺不仅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也为大陆的现代曲艺创作开拓了地方叙述（local narrative）的可能性。徐素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在甘肃省莲花山的花儿和花儿会这一多民族的民间文化中政府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徐 2009: 399-435）。她通过对花儿的语境分析以及对“掌柜的”（sponsor）这个群体的存在及其对花儿的影响的分析，揭示了花儿在建国后是如何在政府的介入下被重构的过程。政府通过充当花儿的“掌柜的”参与民间活动，把花儿作为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同时政府的现代化政策、革命的概念等也通过花儿被民间文化所吸引，而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在花儿中可以看到民间和国家领域的并存。

### 3.2 从亲族制度、葬俗等礼仪制度来看革命与传统的连续性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亲族制度研究始于二战前，它一直是日本人类学者中国研究的主线，并且研究成果丰厚。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亲族制度仍然是日本人类学界主要的关注对象。但是，与具有东方主义色彩和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学者不同，新一代的学者更注重亲族制度和观念在社会主义集体化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变化和延续性（中生 1990）。新一代的学者他们更注重亲族制度和观念在社会主义集体化过程中的变化和作用、香港城市的宗亲会（吉原 1987: 142-163；吉原、鈴木、末成 2006）、亲族制度中的女性角色和姻亲网络（植野 2000）等，并用历史的连续性来说明父系继嗣原则的延续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宗族复兴（瀬川 1996；2004）。此外，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亲族制度的变化、延续和重构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留学的学者主要的考察对象（聶 1992；韓 1995；Han 2001；韩 2007；萧 2000；潘 2002；阮 2005；秦 2005）。例如，参加民博的中国研究课题组的秦兆雄以湖北汉族村落为例，从个人的辈份、性别和年龄的角度考察了家族、亲族和宗族的原理、范围和形态。通过对人民公社集体化的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家族和宗族的理念、组织和实践的比较，指出在毛泽东时代，合同家族、父权和儒教伦理依然存在；宗族组织虽然受到了破坏，但是辈份等秩序和宗族意识仍然起着一定的功能作用。他用上门女婿改姓归宗的现象证明了以上的看法。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自由化和个人主义的抬头导致了提早分家、合同家族和直系家族的解体以及老人扶养等问题（秦 2009: 313-342）。他的结论是：在毛泽东时代，家族和宗族受到的冲击主要是来自国家的政治影响；而改革开放以后，家族和宗族受到的是经济自由化、少子化和个人主义的影响，这些对家族和宗族的影响远远大于毛泽东时代来自国家的政治影响。

除了父系血缘的宗族实践之外，课题组还通过丧葬、冥界信仰、婚俗、男女对歌等，对20世纪的辛亥革命、社会主义的近代性以及传统信仰的变化和延续性进行了讨论。例如，何彬通过对20世纪初到现在北京的八宝山等地对葬礼、埋葬法、墓地和祭祀进行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何 2009: 183-213）。她指出由于政府使用了行政手段，北京的丧葬民俗发生了巨变。民众灵活地适应了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现代化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都市社会的新民俗。在火葬普及的现在，在汉族的深层意识中依然存在着传统的灵魂观和冥界观念。骨灰盒成了死者居住的



家。汉族原有的“灵肉一体”的灵魂观在火葬普及后的今天变成了“灵骨一体”。田村和彦以在陕西省中部地区的公墓产业和殡葬改革为例，揭示了“死”的革命带来的变化以及民间知识的延续（田村 2009: 215-250）。他的特点是在考察殡葬改革的实践时，注重了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的推进者、代理者（agent）——公墓服务中心和经营性的公墓事务的存在及其作用。

谢荔援用了法国人类学家丹·斯珀伯（Dan Sperber）的“公共表象”（public representation）、心理表象（mental representation）的概念（スperlベル 2001），对90年代四川地区宗教设施的雕刻、壁画、劝善书等冥界观念的公共表象与村落的死者礼仪中灵魂救灾观念的个人心理表象进行了考察。她对操作葬礼的宗教职能集团“坛”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该集团的礼仪和在家信徒的巡礼揭示了公共表象与个人心理表象的连锁关系。她指出了冥界信仰的连续性，并对复兴后的灵魂拯救的礼仪实践中的“劝善惩恶”和“孝”“和”的家族伦理观念进行了重新评价（谢 2009: 251-276）。塚田诚之使用了对近代报纸的文本分析方法，对1930年代到1950年期间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权下的文化政策、法规以及社会动员方式的异同点进行了梳理和比较。他列举了广西报纸中有关婚俗、男女对歌、起居卫生、信仰、服饰的规定和改革实践的大量记述，得出了结论：两个政府对壮族实行风俗改良时，均以政府的尺度，以婚俗和迷信为主要改良对象，并展开了卫生运动。两个政权虽然在社会体制上存在着极大差异，但在改良风俗的规制和实践上却差异不大。比起50年代共产党政府的风俗改良，30年代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改良对象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我们现在看到的壮族风俗习惯是在30年代和50年代被改造过的（塚田 2009: 157-182）。上述的研究论证了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从亲族制度、殡葬等风俗改革的影响，并指出了革命与传统以及与现代社会的连续性。

### 3.3 革命的记忆与社会转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革命下产生的注重制度和现实生活实践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些作为社会记忆和文化资源仍在日常的生活实践、旅游、艺术、民间信仰等领域被重新构筑、表象和消费。例如，东美晴用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对上海人的旅游景点的选择和旅游心理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侧重考察了以革命表象为消费对象的人群及其旅游动机（東 2009: 345-365）。她指出与选择海南岛的度假型旅游、云南的民族旅游的游客相比，选择革命圣地的游客仍算少数。而对革命圣地感兴趣的游客主要集中在40岁左右这个年龄层。她用怀旧的概念解释了这个年龄层的游客心理。

此外，作为中国革命象征符号的毛泽东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今天，在政府的言说、国家媒介、民间记忆、旅游等活动中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已经开始受到在日学者的关注。笔者在以2003年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政府、民间团体以及个人在韶山举行的各种纪念·祭拜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为例，用涂尔干（Durkheim）的集体表象·个人表象的概念以及特纳（Victor Turner）的象征概念（ターナー 1981）对毛泽东的多重象征意义进行了考察（韩 2009: 367-397）。笔者对表象的主体进行了分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韶山当地人、外地的农民、工人或职员、公务员及学生，并把由这些主体展示出的象征意义及其口述进行分类整理，揭示了毛泽东意义的多重性与职

业、阶层、年龄的关联性。她还指出：政府主办的诞辰庆典的舞台表述了国家的记忆，演绎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延续性。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尾叶子对中国近代革命研究的独特角度和对革命的参与实践（深尾 2009: 475-509）。她叙述了自身和家族的经历，以自传的方式折射了196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影响以及19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日本人对现代化的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深尾作为一名学者开始在中国作社会调查，尤其是在对陕北黄土高原榆林地区的调查过程中，她注重与当地人的互动，参与了对当地生态文化的保护，并通过“黄土高原生态文化回復中心”和“黄土高原国际民間綠色网络”的建立过程，研究并参与了另一个革命——绿色革命的实践。

## 结语

以上，笔者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例，考察了日本与中国的人类学互动以及日本人类学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历史和特点。

与欧美的中国人类学研究相比，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是在对自身的界定和文化寻根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地缘性和文化上的亲密性，比起欧美的人类学界，日本更注重起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中国的相关性，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用生态、历史的、文化复合的比较方法，在东亚或欧亚大陆的框架下研究中国社会，并继承了东洋史的学术传统，是中国学式的研究（sinology）。日本人类学界对中国社会的关注角度很广泛也很细微，从生态环境、动植物的利用技术、神话传说、族群的界限到近代的漫画、连环画、小人书、报纸、亲组制度、殡葬改革、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实践。这些特点充分地反映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组织的有关中国15个课题组的研究实践中。

日本的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从早期就很注重对世界各地民族文物标本的收集。从1930年代开始，日本民族学会就希望拥有一个属于学会的，全国性的民族学博物馆。时任民族学理事长的白鸟库吉和涩泽敬三等就意识到了民族文物标本的重要性，一直想建立一个以日本民族学会为中心的民族学建立博物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和与日本文部省的交涉，终于在1973年设立了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筹建组。也就是说民博的形成是在日本民族学会的基础上，经过了40年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由于日本民族学会是民博的成立基础，它也决定了民博的属性，即拥有博物馆的研究所。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民博成立初期与梅棹馆长对谈话时，说过“民族学博物馆既研究又展示，这在日本还是从未有过的尝试”（梅棹 1978: 50）。换句话说，对于民博来说，对于物品的收集和展示是作为人类学研究实践的一部分展开的。

从1982年到现在为止的有关中国的15个共同研究课题的脉络以及笔者组织的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共同研究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民博在长期的共同研究的理论积累中，逐渐成为完善了民博在日本国内与大学等学术机构合作的学术模式，并成为日本人类学的研究基地和日本的中国研究的重镇。

民博不仅是日本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博物馆，它也是20世纪后期重要

的文化交流场所，为日本及世界各地提供了文化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从1979年以后民博在民族资料的收集和学术考察等方面与中国国家民族委员会、民族文化宫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央民院等学者的合作历史，可以看出民博在民族文化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实践方面，逐渐形成了与当地的政府、学者和草根社会的交流模式。近几年，作为亚洲和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中心之一，民博已于世界20个大学和学术机构签署了学术合作协议。在大陆中国，民博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蒙古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之间都建立了学术协议，双方根据协议展开学术会议、人才派遣、共同考察、出版刊物的交换等多方面的学术交流互动。

日本的中国人人类学研究在研究主体、课题、问题意识等方面在发生着变化。以上笔者对日本民博的中国共同研究课题组的综述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2017年11月民博了迎来它的开馆40周年。面对多变复杂的当今世界，民博将以“点”（民博自身的改组）、“面”（加强与海内外研究机构的网络构建）、“立体”（发挥大学共同利用的功能，推进共同研究体制的构建）的研究战略开始它的下一个时代（西尾、池谷、野林 2016: 4-6）。在过去的40年里，民博的共同研究逐渐由国内走向国际，今后将在与研究对象的当地学者进行双向交流的同时，与更多其他地区的学者进行多向的交流。

## 注

- 1) 圆仁是请益僧。请益僧是指那些已学有专长、带着疑难问题入唐请教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出国进修人员，其地位高于一般的留学僧。当时，日本朝廷组织第十九次遣唐使团也是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使节是藤原常嗣，四艘船全部人员共六百五十人左右。圆仁携带着日本比叡山延历寺有关法华经与密教的整合性有待解决天台教义三十条，以“请益僧”的身份入唐求法。圆仁经历了两度渡海失败之后，第三次登上西行的大船。经过海上十九天的风浪颠簸，九死一生，终于登陆成功，抵达扬州。
- 2) 八大家包括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叡。
- 3) 『行記』838年（开成4年）7月2日。<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86%86%E4%BB%81>（2017年8月24日阅览）
- 4) 希柏德 Heinrich von Siebold (1852-1908年)，奥地利的外交官·考古学者就认为阿依努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 5) 鳥居龍藏 (1870-1963) 被称为日本的第一个人类学者、日本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创建者。1894年作为标本整理员，进入東京帝国大学坪井正五郎的人类学教室。
- 6) 2013年10月19日在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日本とは——日本民族学の二〇世紀 鳥居・澁澤・梅棹・佐佐木」再次探讨了这个问题。
- 7) 包括日本北部温带的落叶阔叶树林带和东北亚寒带的常绿针叶树林带。
- 8) 此外，横山还利用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研经费，组织了东亚的地区的民族/族群的比较研究（横山 2001a; 2004）。
- 9) 课题组的24名正式成员名单以及工作单位如下（2006年）：  
在日中国籍学者：韩敏（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副教授）、何彬（首都大学东京 教授）、聂莉莉（東京女子大学教授）、潘宏立（文教大学 教授）、秦兆雄（神户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汪晓华（大阪薰英女子短

期大学 非常勤讲师)、谢荔(法政大学 副教授)、徐素娟(大阪大学博士生)、薛罗军(神戸女学院大学 非常勤讲师)、周星(爱知大学 教授);日本学者:东晴美(流通经济大学 副教授)、渡边欣雄(首都大学东京 教授)、井口淳子(大阪音乐大学 教授)、横山广子(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副教授)、濑川昌久(东北大学 教授)、巴牧阳一(埼玉大学 副教授)、深尾叶子(大阪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田村和彦(福岡大学 讲师)、武田雅哉(北海道大学 教授)、西泽治彦(武藏大学 教授)、小长谷有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教授)、小熊诚(冲绳国际大学 教授)、佐佐木卫(神戸大学 教授)、塚田诚之(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教授)。

## 参考文献

(中文)

船曳建夫

2011 《新日本人论十二讲》蔡敦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敏

2007 《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韩敏、末成道男编

2014 《中国社会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及其动态——东亚人类学者的理论探索》(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90) 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末成道男

2014 “中华汉族的家族和家——东亚人类学调查之所见”马茜·邹双双译,韩、末成编《中国社会的家族·民族·国家的话语及其动态——东亚人类学者的理论探索》(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90), pp. 93-102, 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圆仁著、顾承甫·何泉达点校

198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文)

東美晴

2009 「革命表象と観光——ノスタルジアに着目して」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 345-365, 東京:風響社。

石毛直道

1973 『世界の食事文化』東京:ドメス出版。

1982 『食事の文明論』東京:中公新書。

2005 『食卓文明論——チャブ台はどこへ消えた?』東京:中公叢書。

石毛直道、ケネス・ラドル (Kenneth Ruddle)

1990 『魚醬とナレズシの研究——モンスーン・アジアの食事文化』東京:岩波書店。

井口淳子

2009 「声と音による革命の表象——農村の曲芸(語り物)を中心に」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 29-51, 東京:風響社。

植野弘子

2000 『台湾漢民族の姻戚』東京:風響社。

梅棹忠夫

1957 「文明の生態史観序説」『中央公論』72(2): 32-49,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 1978 『民博誕生』 東京：中央公書。
- 江上波夫
- 1967 『騎馬民族国家』 東京：中公新書。
- 江守五夫
- 1993 『日本の家族と北方文化』 東京：第一書房。
- 1998 『婚姻の民俗——東アジアの視点から』 東京：吉川弘文館。
- 円仁
- 1970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 足立喜六訳注，塩入良道補注，東京：平凡社。
- 汪曉華
- 2009 「文化大革命期の服飾文化」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 pp. 75-106，東京：風響社。
- 岡正雄
- 1958 『日本文化の基礎構造，日本民俗学大系2』 東京：平凡社。
- 1979 『異人その他——日本民族=文化の源流と日本国家の形成』 東京：言叢社。
- 小崎道雄、石毛直道
- 1986 『醜態と食の文化』 東京：ドメス出版。
- 大林太良
- 1973 『日本神話の起源』 東京：角川選書。
- 1984 『東アジアの王権神話 日本・朝鮮・琉球』 東京：弘文堂。
- 何彬
- 2009 「現代の表象と伝統の変遷——北京の墓地と葬法に関する考察」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 pp. 183-213，東京：風響社。
- 韓敏
- 1995 「宗族の再興」曾士才・西澤彦治・瀬川昌久主編『アジア読本・中国』 pp. 79-87，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 2009 『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 東京：風響社。
- 2015 『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文化変容の諸相——グローバル化の視点から』 東京：風響社。
- 君島久子
- 1989 『日本基層文化の探求——日本民間伝承の源流』 東京：小学館。
- 阮雲星
- 2005 『中国の宗族と政治文化——現代義序郷村政治人類学考察』 東京：創文社。
- 佐佐木高明
- 1971 『稲作以前』(NHK ブックス) 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1980 「中国における資料収集と調査——中国の旅から帰って」『民博通信』8: 2-11。
- 1982 『照葉樹林文化の道 ブータン・雲南から日本へ』(NHK ブックス) 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1991 『日本史誕生』 東京：集英社。
- 1993 『日本文化の基層を探る——ナラ林文化と照葉樹林文化』(NHK ブックス) 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1997 『日本文化の多重構造——アジア的視野から日本文化を再考する』 東京：小学館。
- 2007 『照葉樹林文化とは何か 東アジアの森が生み出した文明』 東京：中公新書。
- 2009 「戦後の日本民族文化起源論——その回顧と展望」『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34(2): 211-228。

志賀重昂

1894 『日本風景論』東京：政教社。

謝荔

2009 「転生に関わる表象および儀礼的实践——社会主義革命前後の四川地域の事例を中心に」韓敏編『革命の实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 251-276, 東京：風響社。

周星

2009 「新チャイナ服、漢服と漢服運動——二十一世紀初頭、中国の『民族衣装』に関する新しい動き」韓敏編『革命の实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 437-474, 東京：風響社。

徐素娟

2009 「建国以来の民間文化の変容プロセス——甘肃省蓮花山花児会を中心に」韓敏編『革命の实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 399-435, 東京：風響社。

蕭紅燕

2000 『中国四川農村の家族と婚姻——長江上流域の文化人類学研究』東京：慶友社。

秦兆雄

2005 『中国湖北農村の家族・宗族・婚姻』東京：風響社。

2009 「個人の視点からみた漢人親族関係」韓敏編『革命の实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 313-342, 東京：風響社。

末成道男

1997 『東アジアの現在——人類学的研究の試み』東京：風響社。

1999 『中原と周辺——人類学的フィールドからの視点』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2007 「多民族・少数民族2分研究のゆくえ——中国研究の場合」『漢族・少数民族の接合——クロスオーバー的視点から見る漢族と少数民族の社会と文化』pp. 170-173, 名古屋：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

スベルベル, ダン (Sperber, Dan)

2001 『表象は感染する——文化への自然主義的アプローチ』菅野盾樹訳, 東京：新曜社。

瀬川昌久

1996 『族譜——華南漢族の宗族・風水・移住』東京：風響社。

2004 『中国社会の人類学——親族・家族からの展望』京都：世界思想社。

武田雅哉

2009 「“雷鋒おじさんに学ぼう！”の図像学」韓敏編『革命の实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 131-154, 東京：風響社。

ターナー, ヴィクター (Turner, Victor)

1981 『象徴と社会』梶原景昭訳, 東京：紀伊國屋書店。

武内房司, 塚田誠之編

2014 『中国の民族文化資源——南部地域の分析から』東京：風響社。

竹村卓二

1994 『儀礼・民族・境界——華南諸民族「漢化」の諸相』東京：風響社。

田辺繁治

1989 『人類学的認識の冒険——イデオロギーとプラクティス』東京：同文館出版。

- 田辺繁治、松田素二編  
2002 『日常実践のエスノグラフィ——語り・コミュニティ・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京都：世界思想社。
- 田村和彦  
2009 「死をめぐる革命と民間知識——陝西省中部地域の公共墓地産業と葬儀改革を事例として」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215-250, 東京：風響社。
- 塚田誠之  
2003 『民族の移動と文化の動態——中国周縁地域の歴史と現在』東京：風響社。  
2005 「中国収集工作的三大原則」『月刊みんぱく』5: 18-19。  
2008 『民族表象のポリティクス——中国南部における人類学・歴史学的研究』東京：風響社。  
2009 「広西における『改良風俗』政策について」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157-82, 東京：風響社。
- 塚田誠之、河合洋尚編  
2017 『中国における歴史の資源化の現状と課題』（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142）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 塚田誠之、瀬川昌久、横山廣子  
2001 『流動する民族——中国南部の移住とエスニシティ』東京：平凡社。
- デュルケム, エミール (Durkheim, Émile)  
1978 『社会学的方法の規準』宮島喬訳, 東京：岩波書店。
- 鳥居龍蔵  
1918 『有史以前乃日本』東京：磯部甲陽堂。
- 中生勝美  
1990 『中国村落の権力構造と社会変化』東京：アジア政経学会。
- 中根千枝  
1981 『社会構造の比較 アジア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旺文社。  
1987 『社会人類学——アジア諸社会の考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9 『中国とインド 社会人類学の観点から』京都：国際高等研究所。
- 聶莉莉  
1992 『劉堡——中国東北地方の宗族とその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西尾哲夫、池谷和信、野林厚志  
2016 「新たな民博の研究に向けて」『民博通信』154: 4-9。
- 西澤治彦  
2009 「映画の中の文化大革命——中国ニューシネマは文革をどう描いてきたか？」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107-130, 東京：風響社。
- 長谷川清、塚田誠之  
2005 『中国の民族表象——南部諸地域の人類学・歴史学的研究』東京：風響社。
- 畑中幸子、原山煌  
1991 『東北アジアの歴史と社会』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潘宏立  
2002 『現代東南中国の漢族社会』東京：風響社。
- 深尾葉子  
2009 「現代に生きる革命の語り——日本における文革体験と黄土高原調査」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475-509, 東京：風響社。

ブルデュー, ピエール (Bourdieu, Pierre)

2001 『実践感覚 1、2』今村仁司・港道隆訳、東京：みすず書房。

牧陽一

2009 「不是鉄、也不是花（鉄でもないし、花でもない）—— 文革から現代アートへの女性の視覚表象」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 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pp. 53-73、東京：風響社。

毛沢東

1968 『実践論』北京：外文出版社。

吉原和男

1987 「香港—— アジアの都市」藤田弘夫・吉原直樹編著『都市—— 社会学と人類学からの接近』pp. 142-163、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吉原和男、鈴木正崇、末成道男編

2006 『「血縁」の再構築——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父系出自と同姓結合』東京：風響社。

横山廣子

2001a 『中国における民族文化の動態と国家をめぐる人類学的研究』（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20）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2001b 「少数民族と法制度に関する比較研究」『民博通信』94: 62-68。

2004 『少数民族の文化と社会の動態—— 東アジアからの視点』（国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50）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渡邊欣雄

1990 『風水思想と東アジア』京都：人文書院。

2001 『風水の社会人類学—— 中国とその周辺比較』東京：風響社。

(英文)

Han, Min

2001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Village in Northern Anhui, China: A Response to Revolution and Reform.*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5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Nitobe, Inazo (新渡戸稲造)

1900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An Exposition of Japanese Thought.* Tokyo: Shōkwabō. (1938年『武士道』矢内原忠雄訳、東京：岩波書店)。

Okakura, Kakuzo (岡倉覚三)

1904 *The Awakening of Japan.* New York: Century.

1906 *The Book of Tea.* New York: Duffield & Company. (1929年『茶の本』村岡博訳、東京：岩波書店)。

Suenari, Michio (末成道男)

1995 Chinese Anthropology in Japan: A View from Inside. In M. Suenari, J. S. Eades, and C. Daniels (eds.)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ociety: Views from Japan*, pp. 1-16. Canterbury: University of Kent.

Uchimura, Kanzo (内村鑑三)

1894 *Representative Men of Japan/Japan and the Japanese.* Tokyo: Minyusha (1995年『代表的日本人』鈴木範久訳、東京：岩波文庫)。



## 附录

## 民博与中国的往来（1978～1999年度）

1978	<p>11月 民博佐佐木高明、第二研究部长访问中国。</p> <p>11月6日 佐佐木高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负责科学·学术的方毅副总理的会见，并提出了希望在中国收集少数民族的服饰和乐器等愿望。方毅副总理当即表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将愿意提供资料」。</p> <p>民博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及民族文化宫提出收集资料和田野考察等学术交流的方案。</p> <p>民族文化宫开始收集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民族乐器。</p>
1979	<p>10月20日～11月10日 为民博</p> <p>民博第一次正式派遣访问中代表团。团长佐佐木高明教授（第二研究部）、君岛久子教授（第一研究部）、藤井知昭副教授（第二研究部）、大丸弘副教授（第五研究部）。</p> <p>10月23日 在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会谈。民族文化宫顾问林耀华教授、主任代理杨廷智、顾问吴泽霖教授和宋蜀华副教授出席了会谈。</p> <p>10月25日 佐佐木高明和林耀华作为双方代表在文化宫的大厅正式举行了资料交接仪式、并确立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与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宫之间有关促进资料收集方面的协助关系。</p> <p>佐佐木高明一行还访问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并举行座谈会；访问视察了中央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师范学校等少数民族的教育机关。</p> <p>11月16日～12月 梅棹忠夫馆长访中、与中国民族学者及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员进行学术·文化的交流、并视察诸博物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向民博赠送该机关刊物《民族研究》直至2016年12月6日现在。</p>
1980	<p>4月1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访问民博。</p> <p>团长 宦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教授）</p> <p>王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副局长）</p> <p>严中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p> <p>何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研究员）</p> <p>蔡美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p> <p>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p> <p>6月2日～7月4日 周达生研究员（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6月18日～7月3日 梅棹忠夫馆长访中、签署了有关学术交流备忘录并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研究机关。</p> <p>7月23日 中国民族文化宫访日友好视察团</p> <p>团长 全家福（民族文化宫副主任）</p> <p>孟昭庆、张士安、李双喜、王景亭、李冬萍</p> <p>10月16日～10月28日 梅棹忠夫馆长访中、视察民族学的研究状况及博物馆。</p> <p>11月12日 中日友好学者（第二次）访日代表团</p> <p>团长 梅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p> <p>肖棣华（中日友好协会理事）</p> <p>钱钟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p> <p>牙含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p>
1981	<p>3月6日～3月18日 林耀华教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同民族研究所所长）作为国际交流基金的文化人短期交流的一环、到民博访问。3月11日在民博举行研究懇谈会「凉山彝族的社会与文化」士</p> <p>3月29日～4月5日 君岛久子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5月23日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展代表团访问民博 团长 宗群（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宋蜀华（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p> <p>10月12日~10月22日 藤井知昭教授（第二研究部）：与民族文化宫进行学术研究交流。</p> <p>10月12日~10月31日 大丸弘副教授（第五研究部）：调查并收集。</p>
1982	<p>2月1日~2月5日 佐佐木高明教授（第二研究部）、藤井知昭教授（第二研究部）：与民族文化宫当局开碰头会。</p> <p>3月18日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会举行「民间传承的比较研究」讲演会。「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发展及现状」贾芝（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p> <p>4月6日~4月18日 君岛久子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学术考察</p> <p>7月18日~7月30日 松原正毅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学术考察</p> <p>10月29日~12月13日 佐佐木高明教授（第二研究部）、田边繁治副教授（第二研究部）·周达生（外国人研究员）中国学术考察</p> <p>11月1日~12月15日 藤井知昭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学术考察</p> <p>11月28日~1月7日 竹村卓二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学术考察</p> <p>12月2日 民博共同研究会「民间传承的比较研究」（代表者：君岛久子） 「傣族诗歌的特徵」王松（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副所长·作家）。</p>
1983	<p>2月9日~3月2日 周达生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3月15日~3月31日 石毛直道副教授（第四研究部）：中国调查。</p> <p>5月5日~5月18日 君岛久子教授（第一研究部）：调查研究</p> <p>6月7日 索文清（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胡起望（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p> <p>8月6日~8月20日 梅棹忠夫馆长：中国调查及博物馆视察</p> <p>8月17日~9月19日 Ruddle、Kenneth 副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调查</p> <p>8月22日~8月30日 崎山理副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1月6日~11月20日 佐佐木高明教授（第二研究部）·松原正毅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1月27日~12月11日 梅棹忠夫馆长：中国调查及博物馆视察</p>
1984	<p>8月6日~8月19日 梅棹忠夫馆长访中，中国调查及博物馆视察。</p> <p>11月28日~12月7日 佐佐木高明教授（第二研究部）、松原正毅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与中方开碰头会。</p> <p>12月7日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团长 费孝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社会学会研究会会长） 团员 张君秋（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谢鉄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浩然（作家） 潘乃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员） 秘书长 张和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p>
1985	<p>2月3日~2月17日 梅棹忠夫馆长访中：调查及博物馆等视察</p> <p>2月3日~2月17日 杉本尚次教授（第四研究部）中国调查</p> <p>3月11日~3月18日 石毛直道副教授（第四研究部）：中国调查</p> <p>3月13日~3月16日 特别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源流的比较研究」研讨会</p> <p>3月15日 张紫晨（北京师范大学 副教授） 郎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p>

	<p>8月1日~8月14日 梅棹忠夫馆长、佐佐木高明教授(第二教授)、周达生副教授(第一研究部)、长野泰彦副教授(第一研究部):参加彝族学会并做调查。</p> <p>9月10日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访问民博 韩念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吴晓达(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p>
1986	<p>2月15日~3月1日 梅棹忠夫馆长:调查及博物馆等视察。</p> <p>6月7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 团长 胡绳(院长) 团员 何方(日本研究所所长) 徐宗勉(「中国社会科学」副编集长、「历史研究」总编) 邱仁宗(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任)</p> <p>6月26日~7月10日 君岛久子教授(第一研究部)</p> <p>7月7日~7月22日 江口一久副教授(第三研究部):中国调查</p> <p>7月2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代表团访问民博 杜荣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任) 张承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p> <p>11月10日 吴新智(中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p>
1987	<p>民博学者到中国调查</p> <p>5月18日~5月29日 石毛直道教授(第四研究部)</p> <p>5月19日~5月28日 长野泰彦副教授(第一研究部)</p> <p>6月15日~6月27日 江口一久副教授(第三研究部)</p> <p>6月24日~7月1日 瀬川昌久助手(第一研究部)</p> <p>6月24日~7月14日 藤井知昭教授(第四研究部)·周达生副教授(第一研究部)</p> <p>中国学者访问民博</p> <p>7月4日~1988年2月29日 外来研究员金道权(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第一语文系副教授)和外来研究员朴敬植(中央民族学院)</p> <p>9月4日~9月28日 佐佐木高明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9月15日~10月5日 大塚和义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1月28日 费孝通(中国·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宗惠(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讲师)访问民博</p>
1988	<p>1月9日~1月15日 藤井知昭(第四研究部):中国调查</p> <p>7月15日~9月11日 佐佐木史郎助手(第一研究部)</p> <p>8月10日~9月11日 松原正毅副教授(第二研究部)</p> <p>9月20日 丁伟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访问民博 张国维(中国社会科学院AA研所长)</p> <p>10月3日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邓敏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谢莉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干部)</p> <p>10月6日~10月17日 栗田靖之副教授(第二研究部)</p> <p>11月14日~12月17日 竹村卓二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1月14日~12月17日 塚田诚之助手(第三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月15日 照那斯图(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邓锐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夫妇</p>

1989	<p>1月8日~1月15日 栗田靖之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月28日~1月31日 石毛直道教授(第四研究部):中国调查</p> <p>3月12日 陶立璠(中国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访问民博。</p> <p>3月13日 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文教委员会文教委员)</p> <p>3月16日 索文清(中国中央民族学院博物馆长)夫妻,中国中央民族学院一行,路文影(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裴家麟(教授)、耿金声(教务处长)、刘树松(该校学生处处长)、李文潮(同副教授)、王庆仁(科研处副处长)访问民博。</p> <p>8月29日 果洪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副主任)访问民博。</p> <p>11月23日~1990年1月31日 塚田诚之助手(第三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2月11日~12月22日 藤井知昭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调查</p>
1990	<p>1月2日~2月21日 周达生副教授、林行夫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等地调查</p> <p>1月4日~2月7日 田边繁治副教授(第二研究部)</p> <p>1月16日~1月30日 藤井知昭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等地调查</p> <p>3月2日~3月11日 长野泰彦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6月26日~7月17日 吉田集而副教授、吉本忍助手(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7月19日~8月23日 杉村栋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2月13日 司马义·艾买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p>
1991	<p>4月24日~4月30日 松原正毅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4月30日 伍精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刘万庆(该委员会办公厅副所长)</p> <p>5月22日~7月25日 松原正毅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7月10日~9月12日 庄司博司副教授(第三研究部):中国调查</p> <p>8月12日~8月30日 须藤健一副教授(第四研究部):访问中国等地、出席讨论会。</p> <p>11月2日~11月11日 藤井知昭、佐佐木高明、周达生、塚田诚之:中国调查研究</p> <p>11月14日 中国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 团长 张瑞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委员会副主席·电影演员) 程十发(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江明惇(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p>
1992	<p>2月17日~2月19日 外来研究员严汝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p> <p>6月1日~6月25日 江口一久副教授(第三研究部):中国调查</p> <p>6月1日~6月30日 周达生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7月12日~7月22日 熊仓功夫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7月19日~7月30日 小长谷有纪助手(第一研究部):中国等地调查</p> <p>11月2日~11月14日 熊仓功夫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1月14日~11月21日 松泽员子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1月18日~11月27日 长野泰彦副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1月21日~11月25日 立川武藏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1993	<p>1月9日~1月13日 藤井知昭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月16日~1月23日 松原正毅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2月26日~3月6日 周达生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2月27日~3月6日 佐佐木高明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3月13日~3月23日 长野泰彦副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调查</p> <p>3月14日~3月29日 塚田诚之助手(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7月29日~8月14日 小长谷有纪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8月17日~9月9日 立川武藏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2月1日 安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p> <p>12月8日~12月15日 田村克己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1994	<p>1月12日~1月16日 大塚和义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调查</p> <p>3月3日~3月16日 小长谷有纪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等地调查</p> <p>3月8日~3月12日 长野泰彦副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调查</p> <p>3月13日~3月20日 外来研究员王景亭（中国民族文化宫文娱馆副馆长）</p> <p>3月13日~3月20日 外来研究员春增世（中国民族文化宫主任）</p> <p>3月28日 刘德有（文化部副部长） 曲润海（艺术局局长）</p> <p>4月9日 孙平化（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关毅（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夫人）</p> <p>4月17日~4月27日 外来研究员伍精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理事长）</p> <p>4月17日~4月27日 外来研究员萧世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秘书、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理事）</p> <p>4月17日~4月25日 藤井知昭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7月1日~7月18日 立川武藏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8月12日~9月12日 横山广子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8月14日~8月24日 佐佐木高明馆长、小长谷有纪副教授：中国调查</p> <p>8月18日~9月8日 朝仓敏夫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9月12日~9月26日 江口一久教授（第三研究部）：中国调查</p> <p>9月21日~9月30日 周达生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0月5日~10月12日 田村克己副教授（第二研究部）：出席中国研讨会</p> <p>10月31日~11月14日 塚田诚之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并收集文献</p> <p>11月20日~11月28日 小山修三教授（第四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2月7日~12月13日 佐佐木高明馆长：中国调查</p> <p>12月16日 中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及发展代表团 团长 陈虹（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沈昌荣（中国少数民族对外交流协会理事） 占巴扎布（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外事司副司长） 谢启晔（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傅东（中国国家财政部文教行政司文化处处长） 索文清（民族文化宫展览馆馆长） 王海青（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外事司干部）</p>
1995	<p>2月1日~2月15日 横山广子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研究</p> <p>2月19日~2月26日 外来研究员金炳镐（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所所长）及外来研究员郑信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p> <p>4月25日~5月5日 石毛直道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8月1日~9月5日 朝仓敏夫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等地调查</p> <p>8月2日~8月20日 塚田诚之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8月23日~8月30日 长野泰彦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0月11日~10月18日 佐佐木高明馆长：中国调查</p> <p>11月3日~11月11日 藤井知昭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1996	<p>3月27日~6月14日 塚田诚之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p> <p>4月15日~1997年3月31日 外国人研究员色音副教授（第五研究部）</p>

	<p>4月24日～5月8日 长野泰彦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5月20日～5月27日 佐佐木高明、横山广子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研究</p> <p>7月3日～7月12日 小长谷有纪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研究</p> <p>7月20日～8月1日 石毛直道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等地调查</p> <p>7月29日～8月29日 朝仓敏夫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调查</p> <p>8月1日～10月15日 阿部健一助手（地域研究企画交流中心）：中国等地调查</p> <p>8月7日～8月31日 松原正毅教授（地域研究企画交流中心）、小长谷有纪副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等地调查</p> <p>10月8日～10月17日 外来研究员陈连开（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外来研究员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外来研究员周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p> <p>10月20日～10月23日 森田恒之教授（第五研究部）：中国调查</p> <p>10月20日～11月5日 熊仓功夫教授（第一研究部）：中国等地调查</p> <p>11月29日 巴莫阿衣（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副教授） 巴莫曲布媒（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p>
1997	<p>1月10日～3月31日 外国人研究员（客员）馬戎教授（第五研究部）</p> <p>1月13日～1月27日 塚田诚之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研究</p> <p>2月27日～8月27日 清水昭俊教授（第四研究部）：中国调查研究</p> <p>3月1日～3月17日 横山广子副教授（第二研究部）：中国调查研究</p> <p>5月19日～1998年5月18日 外国人研究员賈蕙萱教授（第五研究部）</p> <p>6月12日～1998年3月31日 外来研究员周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教授）</p>

这个附录是笔者根据民俗馆长室秘书森はゆま（Mori, Hayuma）女士从『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十年史』、『民博通信』的资料中提取而成的资料编写而成的。在此对森はゆま（Mori, Hayuma）女士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